



# 龚江集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 第六辑

张修桂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 第六辑

# 龚江集

张修桂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龚江集/张修桂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6)

ISBN 978-7-208-12501-8

I. ①龚… II. ①张… III. ①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IV. ①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0593 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封面设计 赵小凡

技术编辑 伍贻晴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第六辑) ·

龚 江 集

张修桂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2 插页 6 字数 469,000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501-8/K·2272

定价 98.00 元



1935 年 8 月生于福建惠安崇武镇，1959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同年至复旦大学工作至今。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专业委员会主办杂志《历史地理》主编。长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和古地图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发表论文数十篇和专著《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其中两篇论文分别获 1979-1984 年和 1985-1994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一等奖。

## 自序

1959年夏,我和同班一位同学,从华东师大地理系本科毕业,分配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当时我对历史地理一无所知,也无所好,但能到复旦大学工作,总是很高兴的。那时研究室的老师们,都在忙于编绘历史地图,我们是门外汉,当然不能编图。为了帮助我们入门,室主任谭其骧先生安排我们抄录《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中的水道,读读《读史方輿纪要》、《大清一统志》,边抄边熟悉古籍,边抄边看他们编图,希望能对历史地理有所感悟。

当年7月1日,复旦历史系成立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同时,代理系主任谭先生就为培养历史地理专门人才,筹备在历史系建立第二个专业——历史地理专业。专业需要的历史教师和历史地理专业课教师,历史系和历史地理研究室人才济济,都能提供;缺的只是地理基础课教师。所以调我们到复旦的初衷,就是准备为专业同学开设地理课。为此,1960年又从中山大学和西北大学调来8位地理系本科毕业生,10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历史地理研究室管辖之下,成立地理教学小组。同年秋季就开始招生。我受命担任教学小组负责人,具体安排地理学各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并组织备课、试讲和听课。但专业连招三届之后,研究室的老师,因编图任务实在繁重,无暇再为同学们开设专业课,从1963年开始,历史地理专业就停止招生。我们这些地理教师,有的就陆续在校内另行分配工作,留在研究室的,则安排做些历史地理资料的抄录和研究室收藏地图的编目工作,并和编图人员一样,按时上下班。

就在1963年夏天,中科院地理所历史地理组,联合该所地貌室和河北地理所地貌室,组织永定河故道调查考察,要求复旦派员参加。我有幸受派参加考察与学习,并参与撰写野外考察总结报告,前后历时5个月的

实践和熏陶,以及拜访和聆听北大侯仁之先生的报告,受益匪浅。10月下旬,我奉命返沪,继续在研究室抄录历史地理文献资料,如《十七史商榷》等等。

但从1964年开始,全国性的大运动再次来临。我被安排前后三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5月底返校,随即“文革”爆发,研究室的编图工作也因之全面停顿,直至1969年。

所以我在研究室的这头10年,基本上是在历史地理的大门口游荡。尽管如此,却也有些开心事。在资料的抄录过程中,我注意到赣江中游某处(忘了)和汉江口有变迁的史实,谭先生知道后,就在研究室的公开场合介绍,这使我这个初来乍到的门外汉,感到很兴奋和感动。

在北京返沪后,作为考察汇报,我把在北京写的《从永定河故道的研究,谈谈历史河流地貌研究方法的一些体会》一文交给谭先生,没想到,谭先生看后随即决定打印,分送全国有关单位和个人。说明谭先生对我的这第一篇历史地理习作是肯定的,我更是受到莫大的鼓舞。

1964年,河北地理所地貌室在永定河调查的基础上,决定对河北平原古河道开展普查,到北大请教侯仁之先生如何开展古河道调查,侯先生随即向他们推荐我的这篇习作,认为是很适合、很不错的参考材料。因为我们曾经在北京共事过,关系很好,他们随后即向我通报拜访侯先生之事,我知道后当然很是开心。

这虽然是些小事,但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下,能得到两位著名前辈的首肯,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我对历史地理的兴趣,特别是对历史自然地理的爱好。

从1969年到1979年的第二个10年,我才开始正式步入历史地理学的殿堂。引导和推动我入门的,仍然是谭其骧先生。

那时尽管“文革”闹得天翻地覆,研究室却因为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尚方宝剑”,从1969年开始便可以恢复工作,继续编绘地图。我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才正式参加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通过编图,训练了历史地理考证的基本功,并逐渐认识到沿革地理的意义和它在研究历史地理各方面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1972年上海筹备在金山卫海滩建设石油化工总厂,需要搞清海滩的

坍涨趋势,邀请谭先生到金山实地了解滩地状况,以便为建厂问题提出意见。7月30日下午,谭先生约我随同他到金山海滩看看,事后我撰写了《金山岸线之变迁》一文,经过谭先生多次批阅和补充资料,并将题目改定为《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12月下旬即以研究室的名义付印,提交“市革会”和总厂筹建指挥部,并分送有关单位。据反映,文章成为建设石油化工总厂的重要参考材料,是筹建指挥部干部们的必读文件。这使我头一次尝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为生产建设服务的乐趣。

1974年8月,文物出版社将马王堆出土的帛地图32张断帛错位照片寄给谭先生,要求进行拼接,并对原图进行复原。谭先生即把任务转交给我,经过个把月的反复比照,终于拼接成一幅48平方厘米(原图为96平方厘米)的汉代地形图,并绘制了复原图,提交文物出版社。谭先生随即据我绘制的复原图,结合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撰写两篇关于马王堆地图的重要文章,分别发表于1975年的《文物》第2期和第6期上。这项工作,促使我对古地图产生浓厚兴趣,使我后来对古地图的研究有别于前人的研究模式。

从1976年下半年开始,谭先生又派我参加中科院主管、谭先生亲自主持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长江”一节的撰写工作,直至1979年完成交稿。其间,我先后撰写《荆江的变迁》、《洞庭湖的变迁》、《云梦泽的变迁》等文初稿,因观点新颖,当时的长办荆实站恰好来人搜集长江历史变迁资料,随即全文抄录带回付印,在两湖水利部门广泛流传,普遍认为文稿为长江中游河湖整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并为其后相关志书的撰写,如《荆江大堤志》、《荆江堤防志》等等,厘清了河湖变迁的相关专题。这又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要意义。

这第二个10年决定了我主要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和古地图的研究。但时运不济,加上自己无所用心,就是这10年,我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直至“科学的春天”来临的1980年,我才在《复旦学报·社科版》发表第一篇文章——《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这时我已经是45岁的人了,说来惭愧。

此后直至2000年退休,除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基础课和专业课

外,因为有多种项目(如国家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震图集、中国历史气候资料汇编、荆江研究项目、上海成陆项目,等等)的成果,特别是70年代积累的研究成果,我才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一等奖2次,三等奖1次,总算得到一点慰藉。

前些年在朋友们的关心帮助下,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才被改编成为《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也就是说,我到了70岁才有第一部个人的专著问世。应当承认,我在完成集体任务上,还算是认真负责的;但在没有规定任务的情况下,除非是有特别让我感兴趣的课题,我通常是不会主动去争取新任务、搞新的研究的,所以成果不丰,也是必然。

退休以来的这15年,大小任务不断,既有研究所的中美合作项目,又有中国地理学界的合作任务,也有个人爱好的“老有所乐”课题,所以也是忙碌愉快地没有闲着。

所谓中美合作项目,是指由时任所长葛剑雄和美国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主任包弼德共同组织、两个单位合作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该“系统”要求突破以往编绘纸质历史地图需要设定的“标准年代”,将中国历史政区沿革考订精度提高到以“每一年”为单位。为此,政区沿革的精确考订,便成为完成“系统”政区数据库建设的关键。葛剑雄就安排以我们几位退休老人为主,做这项基础性的考订工作。我负责并完成福建(包括台湾岛)、广东(包括海南岛)、广西三省区的县级及其以上政区沿革考订。其中,明清时期福建(大陆地区)县级政区的考订,还落实到县界的每一年变化,成为“系统”庞大政区数据库中最为完整的一个小小部分。

在此期间,中国地理学界合作编撰“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10部,其中,《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一书,由邹逸麟和我任主编、王守春为副主编。该书是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的基础上,汇集20年来诸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编写而成。我在其中负责长江、海河和上海海岸等的撰写,采用的资料主要是我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研究成果。该书已由科学出版社于2013年10月出版发行,相信能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起到一

定的推动作用。

以上两项集体任务基本完成之后,由于个人对长江中游研究的偏好,想从《水经注》注释入手,恢复公元5世纪长江中游的河湖地貌形态,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较为公允的比较平台,同时也可为今后重新整理《水经注》和新编《水经注图》作些前期准备工作。适时得知,复旦大学文科科研推进计划有一项“金秋”项目,是专门为退休教授“发挥余热”、“老有所乐”而设立的,我便提出申报并连续三次获准,遂有长江中游河段、汉江流域、洞庭湖水系等三项6篇《水经注》校注成果发表。

以上记述的是我到复旦至今55年来既简单又平庸的历程,虽然不勤奋,但确实也做了一些工作,总算也为建设中国历史地理学这座不大的殿堂添加了一砖片瓦,大致不太辜负恩师谭先生在天之所望。

数月以前,接到吴松弟所长通知,为作纪念并积累研究所的研究档案资料,所里决定为退休的老师出版个人论文集,这无疑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遂按所里的安排,编成了这本文集。文集取名“龚江集”,别无深意。“龚江”是我曾用的笔名,“龚”是我母亲的姓,又可释为“恭敬”,谐音“攻”。因为我比较喜欢研究自然界的江河湖海,意欲以恭敬之心,探究、攻克其在历史上复杂的演变过程。

文集所收的20篇文章,大部分是退休以来所撰写的,其中主要有“老有所乐”的6篇《水经注》校注,和“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1篇释文,均属注释类,读起来可能枯燥乏味,就权当是研究所的资料积累吧。另外8篇属于研究性文章,其中4篇是退休以前的旧作,因体例关系,基本上没有收录在《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一书中;还有3篇相关图集的前言、序和编图体会,以及2篇纪念性文章。此次付印,除偶然发现个别错处更改外,原文基本不作改动。其中的4篇旧作,是徐建平副教授帮助转换成电子文本并请卢杉认真校对,陈伟庆、孙涛、林宏帮助绘制书中插图,特此一并致谢。

张修桂

2014年春节于复旦三舍

目 录

自序 . . . . . 1

《水经·江水注》枝江—武汉河段校注  
与复原(上篇) . . . . . 1

《水经·江水注》枝江—武汉河段校注  
与复原(下篇) . . . . . 23

《水经·沔水注》襄樊—武汉河段校注  
与复原(上篇) . . . . . 50

《水经·沔水注》襄樊—武汉河段校注  
与复原(下篇)  
——附:《夏水注》校注与复原 . . . . . 83

《水经注》洞庭湖水系校注与复原(上篇)  
——附:《水经·涟水注》校注  
与复原 . . . . . 123

《水经注》洞庭湖水系校注与复原(下篇)  
——附注:《水经·油水注》 . . . . . 160

十年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  
新进展 . . . . . 199

历史时期荆江的变迁 . . . . . 207

|                   |     |
|-------------------|-----|
| 上海地貌环境变迁与先民生产     |     |
| 文明创建              | 250 |
| 上海浦东地区成陆过程辨析      | 272 |
| 赤壁古战场的争论和旅游资源的开发  |     |
| ——兼与冯金平先生商榷       | 283 |
| 中国历史上的大地震         | 310 |
| 青龙江演变的历史过程        | 318 |
| 阳山关与阳山县           | 330 |
| 谭其骧先生创建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  |     |
| 专业                | 339 |
| 开辟中国历史地理学新阶段的史念海  |     |
| 先生                | 343 |
| 《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序       | 348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地图集·    |     |
| 自然灾害图组》前言         | 349 |
| 《中国历史地图集》自然地理要素   |     |
| 编绘点滴              | 352 |
| 明清时期福建省大陆地区县级政区释文 |     |
|                   | 356 |

## 《水经·江水注》枝江—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上篇)

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其在历史地理方面系统、详尽的记述，更是没有任何历史著作可与之媲美。它保存着我国6世纪及其以前丰富的历史地理资料，为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特别是历史自然地理，提供了极其丰富、宝贵的资料。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水经注》的记载，6世纪以前中国河湖地貌的研究，将陷入极大的困境，6世纪以后的研究，也将失去可供比较的平台，研究也难以做到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精度。

但因酈道元是北方人，未到过南方，过去总有人否定《水经注》关于南方部分记述的精确度。不可否认，《水经注》涉及当时全国的河流，酈道元大多是根据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文献进行撰述，南方一些偏远地方，因参考资料缺乏或存在精度问题，撰述时有失精准也是在所难免的。但南方开发较早的地区，特别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如汉魏南朝荆州地区（今湖南、湖北两省），当时文化相当发达，仅以“荆州”为名的地志就有好几部，它们分别详细记载荆州地区的各种地理事物，酈道元注《水经》时，有关两湖地区的地理景观，大量参考这些荆州地记，所以《水经注》关于两湖地区的地理记述，特别是长江中游河湖地貌的记述，就相当详细准确，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因此，对《水经注》记载的南方河流，应当区别对待，不可全盘否定，尤其是对那些记述详细的南方河流，因资料难得，更应特别珍惜和重视。

《水经·江水注》就是酈道元《水经注》撰述最为详细、最为生动的中国南方最为重要的河流。其中，枝江—沙羡河段，从历史地貌学、河床演变学的观点分析，是《水经·江水注》篇中最为典型、最有研究价值的河

段。但因该河段河势极其复杂,《江水注》有的段落的记述不易理解,今本《江水注》文字又存在一些讹误和错简,之后江水的变化更是错综复杂不易辨识,明清以来虽有学者对该河段南朝时期的河势进行一些解释,终因缺乏河床演变的基本知识,或错误地理解原文本意,结果自然不能符合《江水注》的原意。因此,对《江水注》该河段进行尽可能准确的校注,辨明今本注文中所存在的讹误或错简,并运用河床演变学的相关理论,恢复6世纪时段长江中游河床的基本形态,无论是在郦学的研究方面或是环境演变研究方面,都是很有意义的。

本校注以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的,陈桥驿的《水经注校证》(简称《校证》)卷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江水》篇为底本,并参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由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简称《注疏》或杨《疏》、熊《疏》)。校注河段从《江水》篇江水经枝江县开始至沙羨县止,相当今长江荆江(枝江—城陵矶)和城汉(城陵矶—武汉)两个河段。校注内容以长江流路、河床形态为主线,兼及与之相关的内容,人物和事迹一般不出注。为阅读方便,分为上下两篇和若干河段校注,标题采用今河段名称,《经》文黑体顶格,《注》文缩进两格编排,校注安排在每一河段之后。校注后江水的复原,采用示意图表示。

## 上篇 荆江(枝江—城陵矶)河段

### 一、上荆江百里洲河段

岷山<sup>[1]</sup>在蜀郡氏道县<sup>[2]</sup>,大江所出<sup>[3]</sup>,东南过其县北。

(以上注文从略,以下经文、注文从略)

又东过枝江县<sup>[4]</sup>南,沮水<sup>[5]</sup>从北来注之。

江水又东径上明城北<sup>[6]</sup>,晋大元中,苻坚之寇荆州<sup>[7]</sup>也,刺史桓冲徙渡江南,使刘波筑之,移州治此城。其地夷敞<sup>[8]</sup>,北据大江,江汜枝分<sup>[9]</sup>,东入大江,县治洲上,故以枝江为称。《地理志》曰:江沱出西,东入江是也<sup>[10]</sup>。其地,故罗国,盖罗徙也。罗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于长沙,今罗县是矣<sup>[11]</sup>。县西三里有津乡,津乡,里名也。《春秋·庄公

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应劭曰：南郡江陵有津乡，今则无闻矣。郭仲产云：寻楚御巴人，枝江是其涂。便此津乡，殆即其地也<sup>[12]</sup>。盛弘之<sup>[13]</sup>曰：县旧治沮中，后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sup>[14]</sup>。县左右有数十洲，盘布江中，其百里洲最为大也<sup>[15]</sup>。中有桑田甘果，映江依洲。自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sup>[16]</sup>。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销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sup>[17]</sup>。县东二里有县人刘凝之故宅，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莱、严子陵之为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淦女，亦能安食。宋元嘉中，夫妻隐于衡山，终焉不还矣。县东北十里土台北岸有迥洲<sup>[18]</sup>，长十余里，义熙初，烈武王斩桓谦处。县东南二十里富城洲<sup>[19]</sup>上有道士范济精庐，自言巴东人，少游荆土，而多盘桓县界，恶衣糲食，萧散自得，言来事多验，而词不可详。人心欲见，欬然而对，貌言寻求，终弗遇也。虽径跨诸洲，而舟人未尝见其济涉也。后东游广陵，卒于彼土。济本无定止处，宿憩一小庵而已，弟子慕之，于其昔游，共立精舍，以存其人。县有陈留王子香庙，颂称子香于汉和帝之时，出为荆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征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间，送丧踰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庙设祠，刻石铭德，号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孙至今犹谓之为白虎王。

江水又东会沮口<sup>[20]</sup>，楚昭王所谓江、汉、沮、漳，楚之望也。

## 校注：

〔1〕岷山，即今四川北部若尔盖、南坪、松潘诸县间的岷山。

〔2〕氐道县，据两汉《志》，脱“湔”字，《水经注》卷四十《禹贡山水泽地所在》：《经》云：“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也可证此氐道县脱“湔”字，当为“湔氐道”。秦始皇置，两汉属蜀郡，故城在今四川松潘县北。

〔3〕《水经》记述的大江、《水经注》谓之江水，时也称为大江，其源流即今四川岷江，并非金沙江。其实，西汉前期自武帝开“西南夷”后，关于西南边疆的地理知识已大为扩展，金沙江已以“绳水出徼外，东至樊道（今宜宾市）入江”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参见《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释·越巂郡）。但因《禹贡》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之言，而《禹贡》在古代被崇尚为经典，学者不敢背离。《水经》岷山“大江所出”，即遵循经典《禹贡》之文，酈道元注《水

经》，虽知绳水比岷江源远流长，但也不敢背离，只有顺从，故云：“岷山，即洩山也，水曰洩水矣。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

“江水”是长江在古代的正规名称，因其源远流长，河道宽阔、水量丰沛，又有“大江”之称，通常简称“江”。陈桥驿在《水经注校释》指出：今长江之名，《三国志》已见记载。《周瑜传》：“且将军大事可以拒操者，长江也。”《鲁肃传》：“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晋书·桓冲传》也有“淮泗通流，长江如海”之文。即至迟三国时代长江已经成名。可能是当时长江之名，仅在南方采用，尚未在全国流传，故《水经》、《水经注》均未使用。

[4] 枝江县，汉置，属南郡，后汉、吴、晋、宋、齐因之。治所有过迁徙，《水经》时代，枝江县治所在今湖北当阳市东南沮漳河西侧，江水经其南。

[5] 沮水，见《水经注》卷三十二，其下游相当今沮漳河，河口段有较大摆动。

[6] 《太平寰宇记》荆州松滋县：“今县西废上明城，即冲所筑。”宋代松滋县治所即今湖北松滋市老城镇，上明故城在老城镇西一里。

[7] 荆州，汉置，东晋时定治南郡江陵县，故址在今荆州市荆州区，晋太元中年，避苻坚之难，迁州治上明城。

[8] 长江出三峡至上明城地区之后，河谷两岸摆脱山岭约束，进入地势开阔宽敞的冲积平原地区，为长江河床自由摆动和分流、分汊河道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9] “江汜”，《注疏》本同。《注疏》云：“《笺》曰：当作江沱。赵改沱。会贞按：《通鉴》晋太元二年，《注》引此作汜。”“汜”、“沱”虽同义，然《禹贡》有“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岷嶓既艺，沱潜既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之文；酈注于此处引《汉书·地理志》也作“江沱”。说明酈道元注《水经》是很尊重先贤的原始资料的，当不至于为一同义的“沱”字而标新立异，《寰宇记》荆州枝江县也作：“江沱出邑西，东入江。”则《水经注》此处原文应以“江沱”为是。赵一清据《水经注笺》改“汜”为“沱”是正确的。胡《注》“汜”字，或是“沱”字形近刻误，不可据改。

“沱”之义，师古注《汉志》：作“沱即江别出者也”，《释水》云：“水自江出为沱”，结合《汉书·地理志》：“江沱出西，东入江”分析，是此“沱”字，广义而言泛指从长江分出的河道，狭义而言即指今长江分汊河型中的汉道。“江沱枝分，东入大江”，是指长江经上明城北，支分出分汊河道后复注入长江，是为今长江百里洲分汊河道的原始形态。胡渭《禹贡锥指》：“王晦叔云：枝江县百里洲，夹江、沱二水之间，其与江分处谓之上沱，与江合处谓之下沱。”

[10] 枝江县的得名，酈道元明确指出是“县治（百里）洲上，故以枝江为称”。则西汉置枝江县时，县治就在百里洲上。《汉书·地理志》南郡枝江县下曰：“江沱出西，东入江”，是为明证。长江因百里洲而支分为江、沱，故枝江县是以县治左右的江、沱形胜而得名。熊《疏》对此已有认同，曰：“似初即治百里洲者。”

赵一清《水经注释》、杨守敬《疏》，据盛弘之“县旧治沮中”之文，因沮中在枝江县东北，故认为《汉志》传世本“西”字下脱“南”字，遂改酈注《地理志》引文作“江沱出西南”。其实，汉代枝江县在百里洲上，沱出县西，正合河势。沮中之枝江县，乃

东汉时自百里洲迁出移置之县，因东晋复迁入百里洲，故刘宋盛弘之谓沮中之枝江为旧治。赵、杨二人显然是没有留意枝江县得名本义和迁徙而致误。酈注此处《地理志》引文，《校证》本据传世本《汉志》作“江沱出西”，是；《注疏》本作“江沱出西南”，误。

[11] 罗，春秋战国时期楚之封国。初治今湖北宜城市西山，其后南迁于今枝江市境，楚文王时（前689—前677年），再往东南迁，秦于其地置罗县，属长沙郡，两汉、吴、晋、宋因之。故址在今湖南汨罗市西北。

[12] 枝江县西之津乡里，是为巴人出三峡伐楚、楚御巴人来犯的战略要地。故里在东晋以后的枝江县西三里，当即在百里洲西首。因洲首动荡不定，春秋时代之津乡，可能在汉代已经消失。应劭所谓汉代江陵之津乡，即酈道元下文所指之江津，与枝江县西侧之津乡有别。

[13] 盛弘之，南朝刘宋时代著名地理学家。其在宋元嘉九年至十六年，曾随荆州刺史刘义庆在荆州任职。其所著《荆州记》，即是在荆州任职期间，实地调查访问之后的作品，史料翔实可靠，是我国早期影响较大的方志之一。原书已佚，王谟《汉唐地理书钞》有辑录。《水经注》江水篇，大量引用盛弘之的精彩记述。

[14] 枝江县治所，《汉志》在百里洲，《荆州记》、《水经注》时代，枝江县也在百里洲。然《水经》谓枝江县在沮中，证以盛弘之“县旧治沮中”，则《水经》当属无误。然枝江县何时从百里洲迁出，又是何时复迁入百里洲，古地志皆不言。据《水经》著作年代推测，迁出百里洲，当可断在东汉某一时段，原因可能与当时长江发大洪水有关。至于复移入百里洲的时间，熊《疏》据《枝江县志》曰，东晋时，避苻坚之难，复自沮中移治百里洲。此说符合苻坚寇荆州形势，当是。迁入的具体时间，可定在晋太元初。而《水经》时代枝江县治的“沮中”，《通鉴》晋元兴三年胡《注》：“沿沮水上下为沮中。”然据此说难为枝江县定位。据《水经注》沮水篇记载，东汉枝江县治所，可定在今湖北当阳市东南沮漳河的西侧，东去南郡治所一百六十里。则“沮中”可理解为沮水中游。

重要的是，此段注文上下文均为记述枝江县境东、西、左、右之地物，于此插进盛弘之关于枝江县旧治迁移文字，显得突兀；且盛弘之引文中“县旧治沮中”与“后移出百里洲西”也不好理解。治所迁徙记述，通常不会用倒装句。盛弘之时代，枝江县治所已在百里洲，盛文中不当在“旧治沮中”后，谓“后移出百里洲”，而当是为“后移入百里洲”才是；如果“后移出”不误，盛氏原文又显然不通，如此则“后移出百里洲”有可能是酈道元的注文。《校证》曰：《水经注》宋景祐间已成残籍，又经辗转传抄，经、注混淆，错漏连篇。所以很可能是前人在整理《水经注》时，看到酈道元在津乡之后，连续引注《春秋》、应劭、郭仲产之文，便以为盛弘之的引文也当安插于此。实际上酈道元所引盛弘之注文，说的是枝江县的迁徙，与《春秋》等三种引文所注的津乡，完全没有任何衔接关系。故疑此段引文，有双重错简之嫌。今试调整改动如下：

其地夷敞，北据大江，江沱枝分，东入大江，县治洲上，故以枝江为称。《地理志》曰，江沱出西，东入江，是也。后移出百里洲。盛弘之曰：县旧治沮

中，去郡一百六十里。其民，古罗徙，罗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于长沙，今罗县是矣。

县西三里有津乡，……《春秋》……应劭……郭仲产……便此津乡，殆即其地也。县左右有数十洲，盘布江中……。自县西至上明……。县东二里有县人刘凝之故宅……。县东北十里土台北岸有迳洲……。县东南二十里富城洲。……

如此调整，则上段乃概述枝江县得名来由、治所迁徙和先民之来龙去脉。下段则专述当时枝江县境内各类地物和历史典故。如此或可更加符合《水经注》原貌。

[15] 长江出三峡至枝江县，因地势平坦，流速减缓，江中淤积大小数十个沙洲，长江因之枝分出数量众多的分汊河道，河道形态属于复式分汊河型。《寰宇记》引《荆南志》云：“枝江县界内，洲大小凡三十七，其十九有人居，十八无人居”，最能准确反映南朝时代枝江县境长江河段沙洲的数量与生态环境。半数以上有人居的沙洲，属于平均洪水位以上的江心洲，其余无人居的沙洲，则属于尚处在平均洪水位之下的沙洲，或者说正处在心滩向江心洲演变的过渡阶段的沙洲。

在枝江县境内三十多个沙洲中，以县治所在的百里洲为最大，长江因此首先被支分为江、沱分汊河道类型。而此分汊型河道中，哪支为主干道的“江”，哪支为汊道的“沱”，《汉志》、《水经注》均无明言，但《寰宇记》引《荆州图》却明确指出：百里洲，“其上宽广，土沃人丰，陂潭所产，足穰俭岁，又特宜五谷。洲首派别，南为外江，北为内江”。大江大河通常为政区的自然分界线。百里洲南的“外江”，显然属于洲上枝江县与江南松滋县的界河，百里洲北侧的“内江”，则属于枝江县境内的夹江汊道，具有“沱”的性质；故此“外江”具有长江主干道性质。前文“江水又东，径上明城北”，以及《太平寰宇记》：“蜀江在枝江县南九里，松滋县北一里”，均可为之佐证。

因此，南朝时段长江出三峡东流至今老松滋之北，首先在百里洲形成“南江北沱”的普通分汊，由于东进流路有数十沙洲盘布江中，如县东北十里的迳洲，县东南二十里富城洲等等，江、沱再次被支分，所以枝江县境内的长江河床形态，总体上西部属于百里洲普通分汊，东部属于复式分汊形态。南朝以后，众沙洲在消长过程中不断与百里洲合并，终于形成宋元以来的巨型百里洲。

[16] 上明至江津河段，分属枝江和江陵二县，相当今松滋老城至江陵城南河段。长江出三峡进入该河段，因地势平坦开阔，河床坡降骤减，出峡泥沙大量在此河段沉积，形成数量众多的沙洲，所谓“九十九洲”，便是沙洲数量众多之意，并非实数。前引《荆南地志》已表明，南朝时代枝江县境内沙洲最多，但大小沙洲也只有三十七个而已，江陵县境内河段据《江水注》统计，也没有超过十个，则该河段沙洲总数当在五十个之内。但就是这一数量，已是当时长江流域沙洲数量最多的河段。

[17] 江中数量众多的沙洲，消长变化、出没无常，是河床演变的客观规律。而“九十九洲”之后“忽有一洲自生”，也可能是客观事实。只不过这里所述，完全是刘宋盛弘之利用楚谚，迎合“今上”宋文帝以宜都王称帝，并非真的沙洲达到百数。